

苗寨新人

杨昌才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苗寨新人

杨昌才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罗兴贵

封面设计:王 剑

苗 寨 新 人

杨昌才 著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 100 千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412-0800-0/Z·66 定价:6.50 元

目 录

我爱凯里	(1)
人生的补偿	(5)
蛇咬记	(9)
包饺子	(11)
满溪垂钓	(14)
啊,家乡的桥	(16)
雾锁加鸠	(19)
阳春三月赏杜鹃	(22)
春游天河潭	(24)
丰都游记	(27)
侗乡肇兴散记	(29)
关中考察散记	(32)
乱 挡	(38)
喜迎乔石委员长	(41)
老红军访上郎德	(45)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刘学民同志二三事	(48)
忘我爱苍生 ——怀念苗族民间文学作家梁彬	(51)
一身正气 高风亮节 ——记舍身为人的烈士张启仁	(55)

同谱友谊曲 共唱团结歌

——黔桂两省(区)三县民族团结侧记 (63)

联谊活动谱新篇 友邻和睦添异彩 (69)

歌乡新事

——陶尧乡推行苗文纪实 (74)

拜寿记

——写在老年节前夕 (76)

她们从苗岭走来

——记黔东南州民族服饰表演队 (80)

月亮山中一园丁 (84)

金牌争夺记 (91)

春催桃李 (94)

星星落到万峰村 (97)

十年情深 (99)

一位老读者的心声 (101)

于无声处 (103)

拔“钉子” (106)

侃洗碗 (109)

苗寨新人 (111)

医务室里的故事 (118)

喊 泉 (122)

重安三桥 (124)

观南开花场 (126)

侗乡风情拾零 (128)

忆批评 (134)

一段往事 (136)

甌脚情思	(139)
慈父的思念	(141)
苗乡情	(145)
神奇迷人的黔东南	(148)
一本充满民族感情的书	
——读李葆中的《苗村侗寨纪行》	(169)

我 爱 凯 里

我爱凯里。决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凯里人，在凯里城头，我居住了近 35 年，凯里有许多往事，许多地方，许多人物，令我留恋。

据史料考证，从先秦起，凯里就开始有了村寨。到隋唐，凯里属播州，大理南诏王派大员杨端统治播州，杨端把凯里作为统治雷公山周围苗岭腹地的据点，直到清康熙四十五年，杨氏才结束凯里统治。雍正十二年（1734 年）设凯里分县，1936 年撤县改区属炉山县，1942 年撤区为镇直至解放。

距凯里城东 30 里的引山，盛产铅矿，凯里成了铅矿的交易市场，仅凯里的老爷号这条街就有 48 座炼铅炉。由于铅矿开采，带来市场的繁荣，所以，别的赶场只是一天，而凯里赶场，都为期两天。传说，凯里城内赶场时，人数众多，人声鼎沸，站在魁星阁或马刨井，仿佛有轰轰隆隆的回音，令人惊心动魄。由于经受数次战争的洗劫，使凯里精华尽毁，人烟凋零。清末民初，豺狼进城叼走小孩子的事，频频发生，所以，现在凯里的地名有老猫洞、野狗冲等等叫法。风流云散，斗转星移，曾一度繁荣昌盛的小京州，凋零到解放前夕仅有 3087 人的小镇。

1953 年的初秋，我奉命到凯里银行当通讯员。那时的凯里银行，是租用水沟边一家姓杨的民房。杨家的房子，四周的墙是用砖砌的，上下两层，习惯叫印子房，当时能住印房的人

家,算是比较好的人家了。记得那时的凯里,劳苦人民当家作了主,处处喜气洋洋,呈现着一派祥和的气氛。但也只有由东门街和西门街较长的一条街道,北门街和水沟边是两条短小狭窄的街道。大街和水沟边之间横着一节不到 50 米的小街,人们称之为丁字口。大街中段北面,是 1950 年元月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帮助下成立的,贵州省第一个自治地方“凯里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由区政府往西 20 米,是炉山民族中学,据说,民族中学前身是“省立炉山师范”旧址。炉山民族中学大门前面,是何家印子房,三间两层,算是凯里最气派的房子。何家是一家爱国工商人士,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何家一次就捐献银元好几百元,被人们传为佳话,何家也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丁家口往西走不远,是生猪交易市场,凯里的罗卜猪的小猪崽,声誉较好,所以市场交易还算繁荣,人们称之为猪市巷。猪市巷外边,有一条田间小路,经过田坝中央经左上牛场坝。我就是通过这条路,从牛场坝越过拱桥,上对门坡去高溪劳改农场送信的。此外,洗马河边还有几家碾米坊、油榨坊、造草纸和打铁红炉。尽管如此简陋萧条,可是我觉得,比我那山乡老家,还是好得多了。

1957 年我在剑河县检察院,因外调工作,徒步从台江走到凯里。这次进凯里,给我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是自治州首届人代会决定自治州政府所在地设驻凯里以后,正在大搞建设,从猪市巷下到田坝中央的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宽敞的公路,田坝的水已经放干,田坝中央分向东西南北的路线已初步划分出来。虽然在凯里只停留一天,然后去了外地,但是已经感到凯里在变化,凯里在发展。

光阴荏苒，岁月已逝，一晃就是 30 年。3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凯里真正发生了奇迹般地变化。一座座现代化的电子工业企业，星罗棋布般地撒满了凯里的沟沟坝坝，冲冲岭岭，沉睡千年的湾溪河湾的旷野上，一条横贯东西的铁道大动脉沿着清水江由西向东而去，围绕着凯里火车站应运而生的各种服务机关、服务设施，闪电般地耸立起来，沉睡千年的湾溪河醒悟了，欢笑了。在宽广的市区，东至大龙，西至高溪，北至清水江，南至小高山下，一座座现代化的高层楼房，按着规划，井井有条地摆布在宽阔笔直的大道上。

凯里是苗岭的腹地，是以雷公山为中心的未归入版图的“幅员一千余里，东西二百十里、南北三百六十里许，计苗民 450 寨，计户二万七千有奇”的“黑苗”“生苗”的主要集镇之一。是这片地方最大的商业集散地。目前，这里公路铁路畅通，周围台江、雷山、丹寨、麻江、黄平、施秉、福泉、余庆、都匀、三都等县市的客商和少数民族都云集凯里，进行物质交易活动。在交易活动占绝大多数的苗族，语言大体相通，而服饰的色调图案，穿着打扮却不一样，各有特色，各领风骚，绚丽多姿，迷人诱人。凯里以北的虎庄、龙场、炉山、湾水、旁海一带活泼可亲的少女们自己绣制在头上的圆顶花边帽，细腻别致，色调优美；东南边开怀褂丁一带的中年妇女们穿戴的衣裳，图案分明，朴实美观；城南的翁堤、鸭塘、舟溪、白午一带妙龄女郎，头饰独具一格，特别精巧，风采夺人；东北面的翁项、地午、凯棠、台盘一带的老年妇女，上穿古色图案的衣服，下穿图案精细的齐脚长裙；尚待认定的侗家姑娘的束装，又特别不同，她们头顶红缨花帽，身穿蜡染服装，犹如披戴盔甲的古代将士，特别引人注目。这众多的少数民族妇女，汇集在集市里，

穿梭在人群中，使整个凯里山城，成了五彩缤纷民族民间工艺的海洋。

到了夏秋之交，在市中心的浓荫树下，苗族姑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会在这里，或交谈市场物资交易行情，或品评来往的青年男子，或交头接耳，或眼送秋波，不时地爆出一阵阵欢快而羞涩的笑声。还有那些制作芦笙和销售芦笙的芦笙匠们，购买和修理芦笙的芦笙手们，边吹边舞，悠扬的芦笙曲，给繁闹的土城增添了美妙的乐章。

近年来，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交通更为方便，稍远的苗族、铜族妇女也赶来凯里做生意，还有头戴花帽，身穿藏袍的新疆、青藏高原的客商。于是在纷繁的苗族服饰中，又增加了侗族、水族、维吾尔、藏族的服饰。单就服饰一项，就叫人眼花缭乱。黔东南考察采风，观光旅游的专家学者，外国友人，只需在凯里畅游一天，对黔东南这块神奇迷人的民族风情，就会略知一二。人们都说，凯里是天然的民族博物馆。

现在，凯里是苗岭万山丛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今年清明节期间，一位老华侨回乡扫墓，他在凯里近半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凯里的发展变化，欣然给我留下一首诗，诗曰：

香炉峰下一清江，澄澈脉脉印山城。
明珠闪耀辉煌照，高塔大厦眼底收。
晓风吹进林深处，万物复苏遍地春。
借问仙境何处寻，柳暗花明孕诞生。

人生的补偿

最近，孩子搬家，偶然翻出我一篇小说文稿，是从三十多年前由成都带回来的竹箱子中翻出来的，稿件和竹箱子一样旧了，都是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时的旧物，已经 37 年的时间。这当中我的工作几经变动，家也搬动了无数次，竟然还能奇迹般地保留到现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仿佛又是对人生追求的一个回归，一个补偿，三十多年前那颗对文学执着追求的心愿此刻又活鲜鲜地显现在已经雪染了双鬓的我的面前。

1957 年秋，我由剑河县检察院保送到西南民族学院进修政法专业。当时的专业是“政法专修科司法检察班”，全班 100 多人，不便于上课，后来分为一、二两个班，我被分在一班。我们班上的同学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的有高中程度，低的连汉语都不会说。除了专修政法专业课程以外，还为我们增设文化课，我虽然只念完小学，也鼓起勇气报名学习初中二年级的文学课。

学习文学课，使我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提高，给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说得具体一点，我是从出洋相中得到启迪，从出洋相中立志写作的。

那是在上鲁迅的《孔乙己》出的洋相。记得给我们上课的是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他知识渊博，课讲得形象生动，很有吸引力。在讲授到鲁迅先生的名著《孔乙己》时，教授提问：“文中的我是不是鲁迅自己？”我未加思索，随口便答：“是鲁迅先

生自己。”突然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因为我没有跨过初中的大门,不知文章的体裁,以及小说创作上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更不知道有纪实和虚构之分,所以引来一阵笑声。我虽被讥笑,但我没有感到耻辱,只是怨恨自己书念少了,知识太浅薄了。可是老师没有一丝责备和嘲笑的意思,而是由此引开来,向我们讲了我从未听过的文学知识。我突然想起了我们苗族的古歌、叙事歌和故事传说。那些世代流传,却也永远痴迷和陶醉着我们苗家子孙的民间文艺,与文字表述的这些不也是有异曲同功之妙吗?下了课,我鼓起勇气问老师,老师说:“人类创造的艺术,不论是何语种,是用什么手法,目的应该是相同的。”我又说:“照你的说法,我也可以写小说啰!”“当然可以。”老师十分肯定地回答。他又耐心地给我讲了国内外许多知名作家,都是没念过大学的人。他还讲了上大学的人,不一定是作家,是作家的人不一定是大学生的道理。

于是我的创作欲望就开始萌发了,记得第一篇作文是根据看到听到的几件好人好事,去掉真实姓名,加上自己的创造串起来的,大约一千五百多字吧。想不到老师竟然把它当作范文,拿到班上当着大家念一遍,这无疑是对我那种冲动的欲望的一次鼓动。于是我便把这篇作文重新加工润色,自己也觉得很像小说的样子了,便壮着胆子寄到当时的《贵州文艺》。这篇作文便成了我向贵州的省级文艺刊物投的第一篇稿件。也就是我感慨万千地翻阅着的泛黄的稿件:题目叫《一包糯米饭》。

内容自然是写那个年代里的事,现在看来,确实幼稚可笑、毛病百出。可当时的编辑并不嫌弃,而是用红笔对稿子进

行了删改。开头一段，中间对清水江的景物描写全删掉了。此外，还作了多处修改。但还是感到不满意，于是把稿子寄回给我，并附信要我对主人公的形象再作些加强，改好后再寄回编辑部。

遗憾的是我当时文学知识缺乏，连“加强形象”都不理解。虽然也拿着稿子征求了一些同学的意见，就是不敢拿去问老师，这篇稿子就搁置下来。这仿佛又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它随我由成都回到贵阳，又从贵阳回到凯里。“文革”中我怕被抄走，特意找个可靠的地方放起来，殊不知放了以后再也找不出来了。想不到又翻了出来，看看这篇稿子，回首往昔，感慨万千。现在真有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慨。当时如果我能斗胆地拿去请教老师，也许《贵州文艺》能发表出来，一旦发表出来，那么我该顺着自己的意愿走下去，那么，命运于我将是另一种安排了。事实上这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在人类社会中，真正能按自己开始的意愿去选择职业的是少而又少，不然，人们总对自己走过来的路发出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呢！命运之舟是这样地将我运载到了另一条航线上。三十多年的日子里，工作和生活都有得失，这也随着岁月的消失而渐渐地淡化去，唯有那颗创作的欲望长久而深刻地折磨着我。然而我并不明白地承受着，这种承受的结果是在工作中忙里偷闲地写了一些东西，近年结集出了个集子《深秋红叶》。那是一个令自己很满意的集子，现在突然明白了，那是三十多年来对那颗心愿的一点补偿。那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反抗行为。生活的现实可以改变人的职业，人的心愿或许在这之中破碎，而作为心愿本身那应该是不灭的，只要心愿存于心中，也决不会随着人的躯体老去，她将如自然界的花——春天有兰，秋有菊，

冬还有梅呢！

现在，工作担子相对地要减轻一些了，那颗欲望又渐渐地旺盛起来，时时地拿起笔来涂鸦，那怕笔意的苍老，他人的嘲笑。人，总得对自己的希望进行不懈的追求。那么其它的都可以不在乎了！

蛇 咬 记

俗话说，一次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我就曾有过一次被蛇咬的经历。

那是 1953 年的秋天，我在凯里人行当通讯员，跟随炉山县人行李平谦副行长到舟溪乡参加物资交流大会回来，翻李家村，过冷水寨不远，路边一丘田的群众正忙着割稻子。李副行长停下来，下到田里同群众一起割稻子，顺便了解情况。我是通讯员，年纪不大，才十四五岁，个子又长得不高，就没有下田，只是在田坎上看管行李。待到谷子收割完毕，月亮已从东边高山上升了起来，我背着行李随着收割稻子的队伍往下走，走到一片斜坡上。这里林深草茂，荆棘丛生。正走着，突然间，我觉得左脚内被一个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觉得周身发麻，忍痛走了几步，疼痛难忍，实在走不动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放下担子来察看我的脚，发现有两个小红印子，他们一看就明白，这是毒蛇咬了，于是把我背进寨子。

这个寨子名叫什么，具体在什么位置，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主人家姓杨，两个老人，儿子媳妇，住的还算宽敞，典型的苗族建筑。进到他家堂屋，我的脚已经肿起来。当时，记得他们说，要使蛇毒不往上窜，需要用一绺妇女的长头发把脚绞住。他家儿媳听了，二话不说，就解开头式，“咔嚓”一声剪下一绺头发来，立即绞在我的脚腕上。那家人守了我一整夜，那老人家一边安慰我，鼓励我不要怕痛。

好容易熬到天亮，他们把我背到凯里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说，他们一时还没有治疗蛇伤的办法，我又被背回银行。正在急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记不得是谁说，西门有个人，解放前在凯里耍过蛇，可能他有办法。这个主意提醒了大家，不一会，便把那个人请了来。我记不得这个恩人的名字了，就叫他师傅吧！那个师傅来到察看我的脚时，我因受不住肿病，已把那络头发上移到膝盖上边。他说还好，如果不用头发绞住，蛇毒攻心，我就没法救了。记得他先叫打一壶酒，然后用碎碗尖片，把蛇咬的伤口重新砸破，他嘴里含一口酒，对着伤口吸起来，吸一口，吐一口，再喝一口酒，再吸，再吐，如此循环反复。他在换气过程中讲，喝酒是消毒、防毒，吸是把蛇毒吸出来。他还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命啊兄弟！

经那位师傅的精心治疗以后，我的脚确实轻松了许多，肿也消了不少，肿得不能弯曲的脚也逐渐地动弹起来。但是，被蛇咬伤的脚仍然在发热发烫，而且烫得特别难受。我问他有什么办法解热消痛。他说办法倒是有，就看你怕不怕臭，我表示只要治好伤，还管他什么臭不臭。于是他用粪桶打来半桶大粪，让我把脚伸进去。果然觉得一阵清凉。这样反复几天，烫得难受的现象消失，肿也陡然消退，我竟然能下床走路了。

在这位师傅的治疗下，我终于活了下来。他报酬要得不多，还要了一只公鸡。

说一次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我确实从那以后，一遇到蛇，不管死的活的，我都记起那次被蛇咬伤。那位师傅给我治疗的情景。我心里都在喊：恩人，师傅，你在哪里！

包 饺 子

近年来不知怎么的，过去的甚至比较遥远的事情，一经回忆，似乎还记忆犹新。而刚发生不久，以至头两天办的事情，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有人说是人老了的缘故，我想也是吧。每当我包饺子、吃饺子的时候，我便想起那位长者，那位可亲可敬的陶澎同志。

1975年底，他带我们州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到天柱县兰田公社蹲点。这是常事了，自从组织上安排我跟随陶澎同志担任秘书工作以后的七八年间，多半时间是跟随他在乡下度过的。他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十分注重实际，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年轻人，总希望节假日在家与家人团聚，而他恰恰相反，越是逢节假日，他越是要到乡下去。在我担任他的秘书的七八年时间里，就难得在机关过个舒心的节假日。那些年，我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爱人一个人拉扯大的。说实在话，当时叫下乡，心里是不乐意的。有一年的国庆前夕，他说要下到岑巩过国庆，我不想去，但又不好说，便转弯抹角地对他讲，那几天到县里去，大家都在休息，你又要到那里去，人家不得不陪着你。不仅人家得不到休息，你自己也休息不好，不如过了节再去。他不听，还说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啊！我拗不过，只好跟着他去。

这次到兰田，是抓冬修水利。他说，他要下力争取在黔东南把双季稻试种成功，也算对黔东南人民作一点贡献，向黔东南